【大师】饶宗颐：大隐于市一鸿儒

2014-03-09 微历史





学习让改变发生

微历史

学界有“北钱南饶”、“北季南饶”之说，他是一位生于潮州的“国宝级”学术巨人

饶宗颐———对这个名字陌生的，恐怕不仅仅是老百姓。他是谁？

北京大学季羡林教授说：“近年来，国内出现各式各样的大师，而我季羡林心目中的就是饶宗颐。”

饶宗颐先生为广东潮州人，长期定居香港，今年是他90寿辰。

从今年年初起，各项庆贺饶先生90寿诞的活动如展览、出版和学术研究活动陆续展开。而由香港九大高校联手合办的“学艺兼修·汉学大师———饶宗颐教授九十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将于12月中旬举行。香港所有高校联合为一位国宝级和世界级的学术巨人贺寿，如此盛举在历史上为首次，由此亦可知饶先生在中国学界以及在世界汉学界的崇高位置。

在饶先生的家乡潮州，亦准备了隆重的贺寿庆典，最大的礼品是新落成的饶宗颐学术馆，饶先生将于12月中旬香港学术界的纪念活动完成之后，前往家乡参加学术馆揭幕礼。

季羡林说：“饶宗颐先生是著名的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文学家、经学家，又擅长书法、绘画，在中国台湾省、香港，以及英、法、日、美等国家，有极高的声誉和广泛的影响。”

清华大学李学勤教授说：“饶宗颐先生治学，与世俗迥然不同。数十年间，著述逾千万字，于学术文化，中西古今，无不会融通贯，得其窍要，及前沿之地位，开风气之先声，为海内外同知共仰。2003 年辑成出版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论文集》，煌煌二十巨册，洵非一般学人所能意想。”

苏州大学钱仲联教授生前评价饶宗颐先生为九洲百世之“东洲鸿儒”。赞扬他是“并世之容甫（汪中，清代哲学家、文学家、史学家）与观堂（王国维）也”。

对饶宗颐先生作出上述评价的，都是中国学术界各领域的权威人物，还有更多来自学术界，以及文学、艺术界的评价不能一一介绍。



李克强总理看望国学大师饶宗颐

“姑苏香腐”让他六岁扬名

在中国内地，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季羡林先生曾对饶先生一生学术成就有过一篇介绍性文字，称饶宗颐先生在中国文、史、哲和艺术界，以至在世界汉学界，都是一个极高的标尺。他的《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几乎涵盖国学研究所有领域，被学界誉为20世纪国学研究的一座丰碑，走出一条国学研究的新路子。

饶先生名“宗颐”，父亲饶锷为他取这名字，是要他师法北宋五子之首周敦颐。饶宗颐出生于广东潮安县大富之家，早年家有藏书楼“天啸楼”，藏书以10万计，这使他从小在诗书画的环境中受到父亲和名师的教导。他5岁读古典小说，从名师习书法；7岁写《后封神》；8岁读《通鉴纲目》；9岁学经史佛典；11岁学绘画……20岁前，已把香港新垦书局出的新书全部读完。饶氏族人津津乐道于他6岁时的一件逸事：当年家乡一位文坛耆宿以城内特产“姑苏香腐”出谜，求唐诗一句，他当即答以“吴宫花草埋幽径”，语惊四座，传为佳话。

饶先生15岁时继承父亲遗志，续修《潮州艺文志》，直到2005年，由他任总纂的《潮州志》重新编印刊行，花时75年。

据香港大学饶宗颐学术馆郑炜明博士介绍，饶先生至今著作约70余种，论文超过五百篇。近十余年来，内地也开始出版他的著作，如《饶宗颐史学论著选》、《老子想尔注校正》、《梵学集》、《汉字树》等。

90高龄的饶先生现在每天都写字、画画。他又选定了两个系列的重大选题，一个是《敦煌吐鲁番研究》，一个是《补资治通鉴研究》，并邀集海内外学者合力攻关，最后由饶先生统筹定稿。现在两个系列已有20本专著在台湾出版，内地也同时出版了一部分。



师承学术巨子治学强调首创

触角遍及各个领域，扎根香港与内地文化血脉相连

饶宗颐先生以中学肄业的学历走上学术道路。关于学术成就，他说：“我的学问首先是受了沈寐叟先生的影响。”

中山大学姜伯勤教授说，沈曾植（寐叟）先生是晚清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术巨子，是清末民初同国际学术界进行了对话的少数前驱人物，对中国学术界产生过重要影响力。“他影响了从王国维直至饶宗颐先生等不止一代的学者”。

还有两个人对他的一生产生过重要影响，一个是清儒孙诒让；另一个是顾炎武。

饶宗颐的治学特点是喜欢提出新问题、新看法。在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和金石学，以及在宗教史、艺术史、文学、梵学等领域的许多学术课题上都表现了首创精神。

饶先生是这样表述自己做学问的方法的：“学问要‘接’着做，而不是‘照’着做，接着便有所继承，照着仅是沿袭而已。”

饶宗颐先生的治学背景，有两个显著特点：

一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能够在一生最能出成果的30年里（上世纪50年代-70年代），避开来自政治的、社会的动乱，在法、美、英等等国际汉学界大环境中，接触到早年流失海外的典籍孤本，并到印度等地作实地考察，从而得以多角度地研究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二是由于始终把根扎在香港，使他可以近距离了解内地考古新发现、学术研究新成果和文化新思潮，文化的血脉没有割断。

饶宗颐访谈录

“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

由于年事已高，90岁高龄的饶宗颐先生由女儿照顾，基本处于闭门谢客状态。

在香港潮州会馆林枫林先生的帮助下，记者来到饶先生经常出现的地方，那是在香港跑马地繁华地带一家以潮州口味为特色的菜馆。先生每周来这里四五次，一般都是由女儿陪着，父女两个在高楼大厦的狭窄街道中散步十来分钟，走来吃上一餐家乡美味。

我们提前到达饭店。等了约十来分钟，一位老人在一位女士陪伴下走进玻璃大门。老人身着宽身粉红色对襟中式丝绸衫，露出里面红色丝绸缎面滚金边中式立领。这样一位白皙、清癯的老人，穿着这样温暖舒服的衣裳，这样微笑着走来，真是令人如沐春风。

从小打坐爱睡“回笼觉”

记者：饶先生，我们向您恭贺90大寿。您这样高寿，又这样精神，真是令人羡慕。

饶宗颐：我年轻的时候，学过一点佛家的、儒家的、道家的东西，每天打坐。我有个习惯，早上两三点钟就起来，做我的研究，做完后又回去睡觉。现在这个习惯改了，年纪大了，不能够做到了。

了解世界汉学是“缘分”

记：我们认真研究了先生的学术年表，又去作了一些对比，感觉先生的研究领域非常宽阔，不像国内同时代很多学者一样受过政治运动的干扰，可以一心做学问。所以想请先生谈一谈看法，就是学术环境对于一个学人的重要性。

饶：这是我生命中的幸运，佛教叫缘分，印度人说“结缘”。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我已经去过世界很多地方。50年代我在香港大学教书时，每年都被派到外国去开会，与欧洲结缘，法国人也授予我儒莲汉学奖；后来我又去印度，在整个国家旅行，学了点印度的东西，明白印度文化是怎么形成的；东南亚也差不多跑遍；后来我又在新加坡大学教书；有机会去了美国……世界上几个主要国家，我都参加他们的汉学研究，在每一个地方与那里的汉学家共同生活一段时间，了解他们做学问的方法，这是我的幸运。

很佩服好朋友钱钟书

记：内地学界有北钱（钟书）南饶，或北季（羡林）南饶的说法，您同钱钟书先生的交往是什么年代？

饶：我们很熟，是好朋友。1980年我在大陆旅行三个月，那一次，我到北京去看他，那时他的《管锥编》还没有出来。

我同钱先生见面后很谈得来，记得一个很有趣味的事情，我送给他我写的一本词，叫《晞周集》。这本书是我在耶鲁大学研究院教书时写的，是“和周美成词全部”，是大名鼎鼎的张充和帮我抄写后出版的。他也送给我《管锥篇》的手稿。我很佩服他这个人，他收集的材料，一点一滴都不放松，一个东西改很多次。这部手稿是在印出来的书上，他自己又在上面加了很多东西，我现在还保留着。

记：季先生同您的友谊也不错吧。

饶：我们的友谊也是很好的。季先生在我的《清晖集》里写的序，我怕会得罪很多人。因为他赞扬我的书画，把我捧得太高了。

感谢顾颉刚和中山大学

记：能说说您同顾颉刚先生，同中山大学的交情吗？

饶：顾先生是我的一个很早的知己，到今天我还感谢顾先生。顾先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的好处是提拔人才。我也是他提拔的，那时我在中山大学的广东通志馆，那时中大在石牌，而这个机构在文德路。我在那里看书，修志，撰写稿子。

记：当年您好像只有十几岁。

饶：我 18 岁。我的学问是中山大学濡染出来的，我感激中山大学。我年轻时邹海滨（邹鲁，前中山大学校长）请我。那时全中国地方志，北京是第一位的，它是首都所在；中山大学是第二位的。

记：这么说中大是您起步做学问的地方？

饶：这个对我的一生都有影响，所以我很感谢中山大学，感谢那些方志。禹贡学会是顾颉刚先生在北京创办的，我在中大参加禹贡学会后，第一篇论文叫《潮州旧志考》，就发表在顾先生主编的《禹贡》半月刊上，这以后我的文章可以随便在《禹贡》上发表。那时顾先生正在主编《古史辨》，他叫我主编第八册《古地理辨》，我也编好了，但是因为一些原因，当时我没有拿出来出版。顾先生是第一个提拔我的人，他在《禹贡》看到我发表的文章，他也不知道我是多少年龄，其实当时我十几岁。这时我同顾先生都还没有见过面。

有怀疑精神才能做学问

记：说到《古史辨》，有一件事想听听您的看法。《古史辨》的思想基础是“疑古”。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以顾颉刚先生为代表的“疑古派”怀疑古文献的真实性，并以“疑古”精神研究古史。上个世纪 90 年代前后，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首席科学家李学勤，他写了一篇《走出疑古时代》的文章，对“疑古”观提出质疑，在内地学界引起一场论战。您对这事怎么看？

饶：这件事情我知道，近代中国100年的学术史都在我的脑袋里。我跟学勤是老朋友，他的《走出疑古时代》我也看了，他批评“疑古”，我觉得比较激烈了一点。因为怀疑精神基本上是做学问的一个条件，学术上没有什么事情是不能怀疑的。我最欣赏季羡林讲我的学问时，有一句话：“他最能发现问题，最能提出问题。”我觉得他这句话最中我的心意。“走出疑古时代”？“疑古”是没有时代的，疑古可以延长到很久，因为古代很多东西我们弄不清楚，人家讲得不对我们就要怀疑，文献记载不清楚，矛盾太多了。我个人认为，我今天还在疑古，因为很多古代的问题不是一下可以解决的，今天出了很多新东西，但也出了很多新问题，有些问题远远没有解决。现在到处都是这样，不是中国才这样。当然没有旧材料就没有办法解释新材料，可是旧材料有太多矛盾，如何把它理清楚？永远也理不清楚。我的立场是这样子。



饶宗颐先生书法作品

中国文化最好部分是“隐”

记：您认为国际上的汉学研究，哪个国家水平比较高？

饶：这个我不批评，我不得罪任何国家。我有一个基本条件，看你能不能写中文。我们在英国，用中文写的汉学论文，他不发表，要求用英文。为什么要求我们的汉学一定要用英文写？这不公道嘛，没有道理嘛。

记：您觉得中国文化最好的东西是什么？

饶：我觉得是能够“隐”。这是了不起的。外国人就是不能“隐”，就要打仗，他们有事不能商量；我们中国还有个“人情”也很好，大家有事还是要坐下来谈判，商量商量，慢慢解决问题，就解决了。外国人一句不合就翻脸了。所以中国人能够容纳很多不同的宗教，但是它平衡，摆平了。

支持北大修“经”修“藏”

记：现在国内有一种文化上的现象，就是关于国学的复兴。您认为对于国学的学习，最为关键的是要注意什么？

饶：比如背诵古诗文，就要商量，哪些应该背，哪些不应该背。也不是所有人都要去研究国学，这个大家都要坐下来研究。国学中有些东西是不必要去学的，比如背《三字经》就没有必要。小孩子学国学，先要把朝代先后弄清楚，就是要了解自己国家基本的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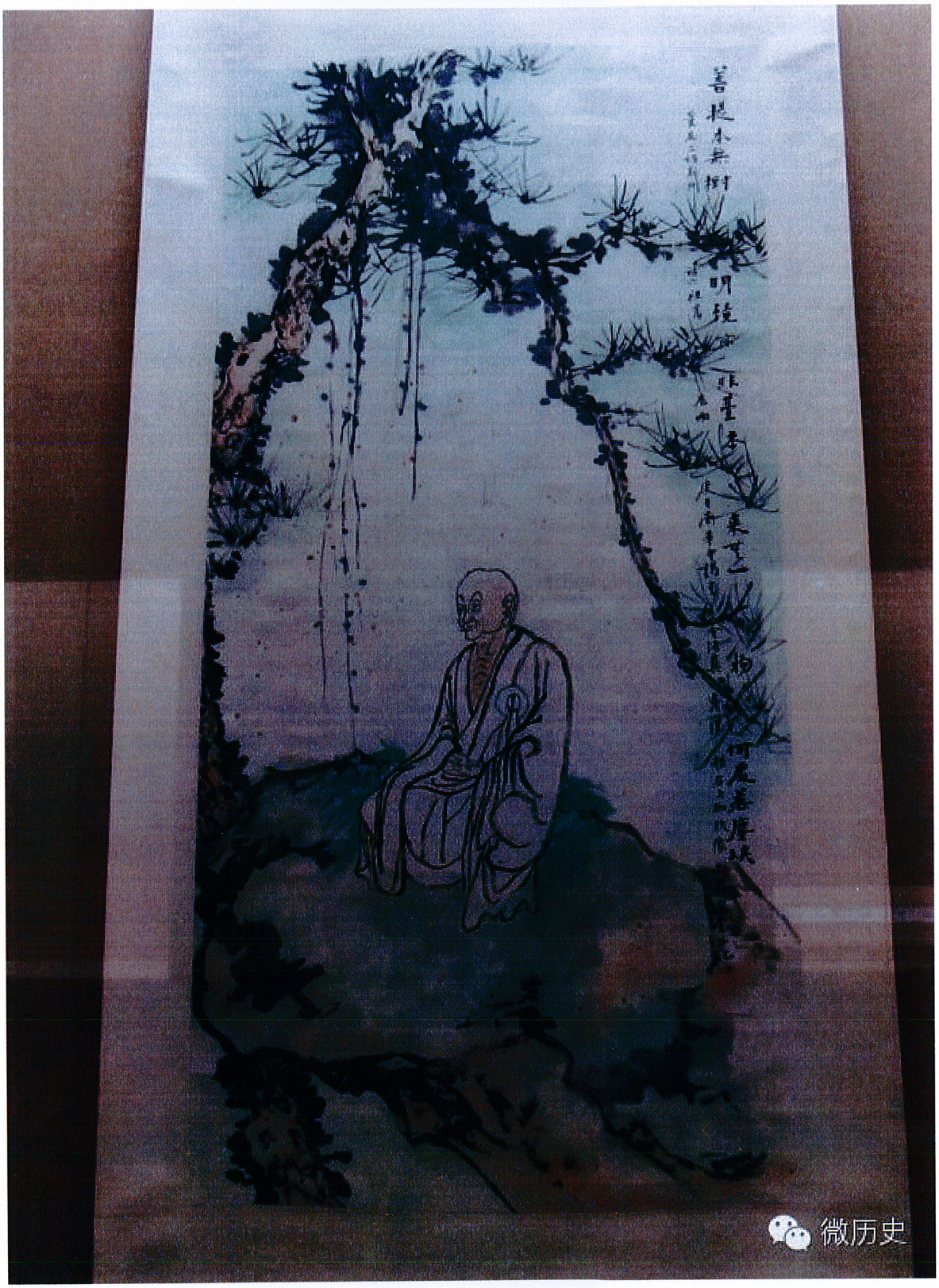
记：有一种思潮，就是反思五四新文化运动，反思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传统文化在传承上逐渐走向断层，你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饶：我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既有它的贡献，也有它的缺点。最大的贡献是白话文，出现了一种新文体，这就是语体文。白话文把语音简单化，这是很大的贡献。那么说到它的缺点，是方法上面的，就是在排除古代的东西方面，太偏激了一点。比如我对胡适先生很尊重，我见过他。我最欣赏他的，是他对自己的小脚太太不离不弃，还有他对人家写来的信都复信。这个我做不到。而对他的方法，就是对他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持保留态度。我认为不要太大胆

假设。科学嘛，是要讲试验的。这个假设不要乱假设，不要太快乱假设，求证是应该的，这是做学问的态度。我对他的这个有保留。还有我们当年把经全部否定，把经变成史，变为史料。我曾向北大的人建议要有我们的经。我们有十三经，但是要改良。比如有些东西不应该入经，如《尔雅》，它是训诂的书，不应该入经，我们的经要重新整理。现在国家昌明，大家要坐下来，研究一下这个问题。

记：现在国家经济条件好起来后，很多地方在修典。

饶：这个我知道，他们是受我的影响嘛。现在由北京大学汤一介先生主持，又开始编纂一部大书，叫作《儒藏》，我在里面做顾问。中国有儒、道、释三家。释、道都有藏，儒家没有藏。儒应该有藏。最丰富的是道藏，它把很多儒家的书摆在里头，比如易经，还有老子、墨子、庄子。我们今天也有非常客观的新材料可以用，可以把包括新出土的文献在内的所有典籍都汇集起来，成为一部最完备的儒学典藏。这部《儒藏》编定之后，就形成了新“三藏”。过去讲“三藏”是指佛教里边的“经、律、论”，而现在这个新“三藏”，是指儒、释、道各有一部经典。我的意思，一个经，一个藏，要整理。我们国家现在提出和谐的观念，这个很好，这些工作都要慢慢做，不要太急。



饶宗颐先生画作

■链接

饶宗颐主要荣衔

法国法兰西学院儒莲汉学奖（1962 年）巴黎亚洲学会荣誉会员荣衔（1980 年）

中国国务院古籍整理筹办规划小组顾问（1982 年、1992 年连续两届受聘）

法国文化部文化艺术骑士勋章（1993 年）香港艺术发展局第一届终身艺术成就奖（1997 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大紫荆勋章（2000 年）

中国国家文物局等联合主办之敦煌藏经洞发现百年纪念大会授予敦煌文物保护、研究特别贡献奖（2000 年）

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2001 年）

2003 年香港大学成立饶宗颐学术馆，以表扬其对学术文化的贡献。（原载《羊城晚报》）